

现代化语境中的权力重构

——凯末尔政权的世俗化改革*

周 术 情

内容提要 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结束了奥斯曼帝国的传统统治，从形式上完成了政权的转移。然而与伊斯兰教有深刻历史联系的奥斯曼帝国传统势力并没有完全丧失经济基础，它在国家政权结构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犹存，因而凯末尔政权的统治根基并不稳固。凯末尔政权的世俗化改革表面上是要实现主权在民的政治理想，而其实质在于排斥传统势力的政治参与。凯末尔政权世俗化改革的主观目的在于重新整合国家与社会权力，进而牢固掌握政权，其客观后果则是实现了奥斯曼土耳其由封建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为土耳其走向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土耳其 凯末尔 政权 世俗化 现代化 权力

作者简介 周术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东史专业博士生（天津 300071）。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国内传统势力大势已去。然而传统力量不会主动地退出政治舞台，新政权尚有诸多亟待完善的方面。政治改革是土耳其共和国初期改革的重心，其核心在于排拒传统势力的政治参与，以达到巩固革命成果的目的。在多项改革措施中，世俗化最具迷惑性，历来为研究者们所重视。¹但在对凯末尔采取世俗化措施的原因及评价问题的回答上尚有深入研究的空间。本文试图结合土耳其共和国初期的时代背景，分析凯末尔实行世俗化政策的动因，并对其世俗化改革作出评价。

奥斯曼帝国传统势力的遗存

农业是20世纪20年代土耳其共和国的经济基础。据1927年人口普查的结果，全国人口1400万，乡村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3.6%。^④封建生产关系在乡村仍占统治地位，除了在安纳托利亚地区有一些大土地所有者以外，土耳其基本保持着小土地所有制形式。地主和乌来玛依然是乡村的实力持有者，他们多雇佣佃农耕种土地，农业缺少创新，^⑤对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并无明显的推动作用。因此与奥斯曼帝国时代相比，土耳其共和国早期的农业并无太大变化。传统农业是原有社会结构的物质基础，维持传统的统治秩序。工业落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同特征，奥斯曼帝国亦不例外。

* 本文承蒙哈全安教授提出宝贵意见，谨表谢忱。——作者

¹ 国外学者卡尔帕特、艾哈迈德、阿尔图尼克及艾维因等对该问题均有精深的研究，但侧重于文化探讨。而国内的研究基本没有超越伯纳德·路易斯教授的研究框架。国内相关研究基本观点如下：（1）世俗化是凯末尔改革的主要内容和目标；（2）只有实现世俗化，土耳其的现代化才可能实现；（3）改革与历史有关，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推动密不可分。

^④ Feroz Ahmad *The Making of Modern Turkey*, London: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1993, p. 94.

^⑤ See Feroz Ahmad *Turkey: The Quest for Identity*, Oxford: Oneworld, 2003, p. 32.

其早期工业偏重军事，民用工业受传统手工业和西方工业排挤，状况之难堪不言而喻。土耳其共和国立国之初，这种状况亦无明显改善。经营方式的落后制约着土耳其工业的发展。到1927年，土耳其有6.5万家工业公司，雇佣了25万人。但是这些公司中，只有2822家使用了机器，多数公司还是工匠作坊模式。¹另外，各个部门不能相互补充，统一的国内市场也没有形成。而且，共和国背负着巨额外债，这是土耳其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工业落后制约着土耳其资本主义的发展。原有的经济基础尚未彻底摧毁，而新政权的经济基础亦未建立起来。由此可见，建立初期的土耳其共和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经济模式，没有斩断传统势力的经济纽带。土耳其地主、乌来玛集团还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他们独立的经济来源依然存在。相对较弱的资本主义经济还在外国的控制之下，新政权并没有真正掌握经济资源，本质上还具有传统国家的特征，这种状况在政治上也有所反映。

与传统经济模式相联系的是传统的政治格局，其核心是权力格局。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是重大政治事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然而，传统政治格局并不会立即完全被打破。与保守势力的较量是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斗争焦点。当时大部分权力还在披着宗教外衣的传统势力掌控之下，因而改变传统的权力格局是共和国初期凯末尔政权首要考虑的问题。奥斯曼帝国是教俗合一的国家，与伊斯兰教的深刻历史联系是其基本特征。伊斯兰教既是上层建筑，也是生活方式，^④这一特征在共和国建立之初，并无根本改变。首先，哈里发作为传统权力的核心，依然可以对凯末尔构成极大威胁。哈里发很可能是一切反凯末尔力量的汇合点，他可以将其在宗教上所起的作用扩及政治领域。苏丹—哈里发作为奥斯曼土耳其国家的合法领袖和穆斯林世界的精神领袖，已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甚至在与凯末尔很亲近的人中也有极深的影响力。^⑤其次，乌来玛在社会中依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土耳其的精英大量蕴藏于乌来玛集团中，他们掌握着国家的法律、教育和宗教等各种对于国家至为重要的权力，甚至凯末尔依靠的人中就有不少是这个集团的成员。这些权力实体无疑是凯末尔通向最高权力之路的障碍。再者，政治精英孕育于传统模式，为权力构成染上了浓厚的传统色彩。独立战争之后，精英们在帝国未来的走向问题上有诸多分歧。凯末尔及其支持者主张结束传统统治，但他们似乎只是少数派。比如饶夫称：“如果废除苏丹制和哈里发制，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权，会遭受巨大的灾难。那是不可接受的。”^⑥最后，凯末尔政权尚无力控制广袤的乡村。与外界的隔膜是土耳其共和国早期乡村社会的显著特征。利用伊斯兰教统治乡民的乡村实力派，构成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沟通障碍。与国家相比，地主和乡村的显贵对农民更有号召力。而农民与伊斯兰教的紧密联系，更增加了政府在全国建立新的权威的难度。原有的伊斯兰秩序在乡村具有牢固的社会基础，政府力量很难在短时期内完全渗入。谢伊赫·赛义德能够以“杰哈德”（“jihad”，意为圣战）的名义号召乡民反对安卡拉政府，^⑦表明伊斯兰教是维系乡村统治结构的重要纽带，以宗教形式发动的反叛活动是地方势力与政府争夺权力的外在形式。由此可见，共和国建立之初，凯末尔并非完全掌握了一切，在权力领域还有无法达到的空间。就连具有广泛政治和社会代表性的大国民议会，也丝毫没有包括那些大部分仍然认为苏丹—哈里发是最理想的宗教领袖的人。^⑧伊斯兰教在民众思想深处尚有深刻的影响，这正

¹ See Erik J. Zü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London: I. B. Tauris & Co Ltd, 1993, p. 204

^④ 参见金宜久主编：《当代伊斯兰教》，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页。

^⑤ See P. M. Holt, Ann K. S. Lambton and Bernard Lewis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528.

^⑥ Niyazi Berkes *The Development of Secularism in Turkey*, Montreal: McGill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309–312. 另见 [英国] 伯纳德·路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68页。

^⑦ See Fahad Kazemi and John Waterbury eds., *Peasants and Politics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Miami: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09.

^⑧ See Roger Owen, *State,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on: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0, p. 23.

是世俗化改革的另一深层原因所在。只有消除民众对伊斯兰教的精神倚赖,才可以为新的权力结构奠定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积聚起来的威望表面上有利于凯末尔重新整合国家权力,但是相对薄弱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严重影响这种声望的延续,争夺国内权力的风潮亦将泛起。故而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获取和巩固权力是凯末尔的首要目标。政治革命的特点在于其瞬时性,而经济、社会的改变则是长时段变化的结果,其结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保持稳定状态,¹所以政治革命是凯末尔等人在当时的理性选择。牢固掌握政权是其他政治和社会理想得以实现的必要途径。而凯末尔作为民族英雄的声望,以及军队、议会和政党的支持构成了凯末尔获取权力的基本条件。因此,在认知上和政治上否定旧有的统治成为共和国初期建立统治新秩序的必由之路。

凯末尔政权世俗化改革的举措

完全掌握国家政权是凯末尔主义者在完成民族独立重任后的首要任务。凯末尔在解放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威望及其手中掌握的政治斗争工具,使他具备了发动政治变革的实力。哈里发制和苏丹制两位一体是传统政权格局的重要特征,也是凯末尔获取国家权力的直接障碍,必须予以废除。1922年,大国民议会宣布废除苏丹制。宗教领袖哈里发与国家领袖苏丹的分离,是政教分离的一个内容,是世俗化的主要目标之一。在颁布废除苏丹的法令后,凯末尔声称:“土耳其人民无条件拥有全部国家主权,不接受苏丹—哈里发任何形式、任何意义、任何方法的统治。”^④随着废除苏丹制,土耳其的政治重心开始东移——由伊斯坦布尔转移到安纳托利亚高原。政治中心的改变反映了奥斯曼帝国传统政治的影响力渐趋式微,帝国主体部分已由土耳其人继承。这个改变“意味着同过去实行一次新的决裂,同时也是废除苏丹之后的合理继续”^⑤,也为进一步废除哈里发制度创造了政治条件。在传统政权结构中神权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当传统制度的主要象征之一苏丹制被废除后,神权的传统即成为新的打击对象。哈里发是所有穆斯林的精神领袖,废黜哈里发必然会伤害广大穆斯林的感情。但哈里发坚实的社会基础,严重威胁着凯末尔的政治实践,废除哈里发制度亦属必然。1924年3月3日,在凯末尔操纵下,大国民议会宣布:废黜哈里发,取消哈里发制,并将所有奥斯曼王室成员驱逐出土耳其国境。至此,传统政权的二元结构从法律上宣告终结。苏丹制和哈里发制被取消后,乌来玛集团成为威胁新政权的主要力量,自然是新的打击目标。随着凯末尔集权主义倾向不断增强,乌来玛的处境雪上加霜。凯末尔趁机废除了伊斯兰教长的职位,撤销了沙里亚部,不再允许独立的宗教学校存在。乌来玛集团有关家庭和个人信仰方面的立法权也被褫夺。1924年4月,凯末尔宣布废除沙里亚法庭。^⅔1924年4月20日,大国民议会获得了自己的立法权。这是世俗化的一个重大成就,有了这个拥有立法权的机构,新的统治者就有了更强大的斗争工具。1926年,大国民议会通过根据意大利法典起草的民法典和根据德国法典起草的商业法典,^⅕对乌来玛集团的最后领地发起攻击。

禁止伊斯兰教干预政权和民众生活是凯末尔世俗化改革的努力方向。广大民众的支持是权力的根基。宗教信仰群体的广泛性,是传统统治模式的社会基础。因此,在清理政权结构中伊斯兰要素的同时,凯末尔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内也进行了一场世俗化改革,以消除传统势力的社会基础。首先改革的

¹ 参见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载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

^④ J. Shaw and Ezel Kural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375–379.

^⑤ [英国]伯纳德·路易斯著;范中廉译:前引书,第272页。

^⅔ See Thomas Patrick Camoll “Turkey’s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A Model for Democratic Islam?”, *Middle East Intelligence Bulletin*, Vol. 6, Issue 6/7 (Jun/Jul 2004), pp. 22–27.

^⅕ See *ibid.* p. 97.

是服饰。服饰习惯，“特别是头饰，是一个穆斯林自我表明一方面忠于伊斯兰社会，另一方面拒不承认任何其他社会的可以看得见的外部标志。”^① 凯末尔在全国以立法的形式向传统服饰习惯发起挑战。1925年8月，凯末尔着手推行废除费兹帽的工作。^② 9月发布法令，规定凡无正式教职者，禁着宗教服装，或者佩戴宗教徽记。另规定政府工作人员必须穿西服、戴礼帽。对服饰的改革是继废除哈里发制度以后，对土耳其社会有巨大震撼力的改革，甚至较废除哈里发制度更严重。它的涉及面过于宽泛，已波及每个传统的穆斯林。服饰习惯，也是一种文化的反映，一经沉淀，便成了人们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剪除它们，无疑会招致人们强烈的反对。也正是由于习惯的这种强大力量可能会成为传统势力的温床，凯末尔才冒天下之大不韪，强行拆除人们的心灵壁垒，以消除传统权力的社会基础，从而达到巩固新政权的目的。在强权之下，国内的反对浪潮未能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甘愿接受凯末尔政府的决定。埃及总法典官和爱资哈尔大学校长曾经联合发表声明，对此表示反对，这也表达了土耳其国内改革者的心声。

另一类改革是在语言、文字和历史方面消除伊斯兰教痕迹。阿拉伯语在土耳其语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土耳其文字是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早在“坦泽马特”时代，改革文字的提议就已经出现。1924年更有人主张完全废止使用阿拉伯字母，但均未获成功。1928年，国民议会通过法律，将土耳其文字拉丁化，^③ 并规定从1929年起，不允许公开在土耳其语中使用阿拉伯字母，这是所有改革中最为激进的步骤之一，具有重大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奥斯曼土耳其是属于历史上有过辉煌的伊斯兰文明，采用拉丁字母，表明土耳其民族对现代西方文明主导地位的认同。^④ 文字改革是对传统的反叛，旨在扫清通往新时代之路的障碍。土耳其字母改革运动，还有削弱封建教权，扩大世俗化的意义。^⑤ 1932年，凯末尔同时在语言和历史方面进行了改革。语言方面按照1929年的基调进一步清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影响。而改革历史的意图就是要证明土耳其存在辉煌的过去，在伊斯兰教到来之前，土耳其人的祖先就有了自己灿烂的文化。伊斯兰教对土耳其来说，不是土生土长的土耳其文化，而是舶来品，将其抛弃亦无可厚非。除在服饰和文化方面的改革外，凯末尔还主张连同其他伊斯兰教的象征物一起废除，历法就是这些象征物中的一项。1925年12月26日，政府宣布废除旧有历法，采用西历，并以24小时作为合法计时方法。西历是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历法，但它以耶稣诞辰为始，不符合穆斯林社会的习惯。在穆斯林社会，采取的是以穆罕默德“徙志”为始的伊斯兰历法，具有深层的象征意义。^⑥ 世俗化的改革体现了共和国政权对传统的反叛：一方面要改变宗教在政权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要削弱它的社会基础——斩断人民与传统的宗教联系。但是这些激进的改革是在人民党一党统治和凯末尔超人的个人魅力的背景下进行的，一旦失去这种条件，世俗化就会遇到巨大的挑战。

对凯末尔政权世俗化改革的评价

现代化，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通常表现为封建主义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成长，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和不可或缺的环节。^⑦ 奥斯曼帝国经受了西方殖民者以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为特征的殖民掠夺，它并没有给土耳其共和国留下充足的现

^① [英国] 伯纳德·路易斯著；范中廉译：前引书，第279页。

^② See Ira M. Lapidus *A History of Islamic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502.

^③ See Ira M. Lapidus *op. cit.*, p. 503.

^④ See Douglas A. Howard *The History of Turkey*, Westpor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1, pp. 98–99.

^⑤ 参见杨兆钧著：《土耳其现代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⑥ See Douglas A. Howard *op. cit.*, p. 98.

^⑦ 参见哈全安：《纳赛尔主义与埃及的现代化》，载《世界历史》，2002年第2期。

代化遗产。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建立便成为奥斯曼土耳其早期现代化的核心内容。“青年土耳其革命”后，进步共和党人致力于经济和政治的民族化建设，但收效甚微。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斯曼帝国成为列强宰割的对象，整个帝国架构不复存在。外国入侵致使民族矛盾上升为帝国的主要矛盾。凯末尔以抗击外来入侵为名，逐渐获得民众的支持，成为民族英雄。民族的独立，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先决条件，也是广大东方国家开启现代化进程的真正开始。一方面，土耳其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获得，为市场经济原则取代自然经济原则和民主取代专制奠定了基础。在民族获得独立并建立起共和国之后，凯末尔政权所推行的世俗主义改革以摒弃传统势力、巩固新政权为目标，其世俗化改革亦成为奥斯曼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凯末尔政权的世俗化改革并非奥斯曼土耳其历史上的首创，而是继承了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传统。早在1826年，麦哈茂德便成立埃夫卡弗管理局，将教门基金统归苏丹掌管，削弱了宗教势力的经济基础，具有明显的世俗主义倾向，可谓世俗化改革的先声。伴随着苏丹集权的加强，传统宗教势力进一步削弱，这为凯末尔时期的世俗化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凯末尔政权的世俗化改革是奥斯曼土耳其历史上世俗化改革的顶峰，给土耳其共和国留下了深刻的世俗主义烙印，对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走向有深远的影响，因此是从属于奥斯曼土耳其整个现代化的总体进程的。

虽然凯末尔政权的世俗化改革属于奥斯曼土耳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改革又有其特定的目标。凯末尔及其支持者宣称世俗化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像西方一样文明的国家，将伊斯兰教清理出政权和民众的生活，这是必要的选择。的确，土耳其共和国的精英分子致力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诸方面的西方化和世俗化的改革，力图以此创建一个现代国家。¹并声称宗教与政治的分离是打开通向西方价值体系大门的必要环节。因此，世俗主义成为凯末尔完成现代化步骤的中心任务。^④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世俗主义没有实现宗教和政权的完全分离，只不过是宗教从属于国家政权，而不是宗教在政权之上。^④政教分离本身并不是改革的目的，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此问题。第一，从政治与权力分配的关系看，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权力分配，凯末尔的政治行为亦无法超越权力斗争的范畴。当凯末尔尚未完全控制国家政权时，一切有关建立现代化国家的构想都是空谈。在共和国早期阶段，凯末尔政权的世俗化改革主要是改变土耳其社会的基本结构，^{1/4}消除土耳其社会的伊斯兰框架，引进新的土耳其民族的概念，^{1/2}以转移人们对伊斯兰教的忠诚，进而削弱传统势力的基础。因此，掌握国家权力才是凯末尔世俗化政策的真正驱动力。例如凯末尔曾经为了利用农民传统的领导者——地方显贵、宗教人士和族长——去争取农民，而放缓了世俗化进程，^{3/4}其改革目的显而易见。第二，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角度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有能动作用。在现代化进行到一定程度时，原有经济基础大多已经遭到破坏，而上层建筑却还保持完整。历史不同的国家，上层建筑亦有不同特征。奥斯曼土耳其的基本特点是上层建筑与伊斯兰教的紧密结合，表现为伊斯兰教对国家与社会的控制。因此，削弱伊斯兰教影响的实质在于打击传统社会的上层建筑，是重构权力秩序的必然要求。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是要通过否定传统的上层建筑实现权力重构，这是凯末尔政权世俗化的主观目的。

然而，凯末尔政权的世俗化改革在土耳其历史上的客观后果亦不容忽视。M·哈坎·雅乌兹在评价凯末尔政权的世俗化改革时，认为尽管国家实行世俗化的政策，但对于民众来讲，伊斯兰教仍保留

¹ See Oliver Roy, *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Islam*, London: I. B. Tauris, 1994, p. 24.

^④ See Walter E. W eker, *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 from Atatürk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81, p. 105.

^④ See Thomas Patrick Canoll, op. cit., pp. 22–27.

^{1/4} See Binnaz Toprak, *Islam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urkey*, Leiden: Brill, 1981, p. 39.

^{1/2} See S. N. E senstadt, “The Kemalist Regime and Modernization: Some Comparative and Analytical Remarks”, in Jacob M. Landau (ed.), *Atatürk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 Leiden: E. J. Brill, 1984, p. 3, 9.

^{3/4} See Feroz Ahmad, op. cit., p. 76.

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世俗化政策使得土耳其国家和社会逐渐疏离。¹ 国家与社会疏离是传统社会的特征，而凯末尔是以一种专制代替了另一种专制，同样造成国家与社会的疏离，似乎说明其改革少有进步可言。然而凯末尔政权引入了现代商品和市场的观念，这是推动奥斯曼土耳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强大武器，也是凯末尔政权区别于传统政权的本质因素。世俗化改革在当时的胜利是奥斯曼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崭新起点。一方面，凯末尔政权的世俗化政策极大地打击了传统势力，基本消灭了存在数世纪的传统社会，完成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初期阶段。尽管世俗化改革是为凯末尔政权的集权化服务的，但在当时，集权是建立民族国家及实现现代化的必经步骤。另一方面，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凯末尔政权的世俗化改革客观上推动了土耳其共和国的民主化进程。尽管主权在民和宪法至上的原则在凯末尔时代并没有真正付诸实践，但通过这种“发展的独裁模式”，凯末尔实现了权力重构，以专制手段构建了土耳其政治民主的外在形式——宪法、议会制度及政党等，客观上奠定了土耳其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为土耳其最终迈向现代化搭建了一个坚实的平台。

综上所述，凯末尔政权的世俗化改革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反映了奥斯曼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新旧势力的激烈抗争。凯末尔政权在权力机构内的世俗化改革旨在排斥传统势力的政治参与，实现权力重构；在社会文化领域内的世俗化则是权力机构世俗化改革的延伸，旨在削弱传统势力的社会基础，是为重构权力服务的。世俗化反对的不是伊斯兰教本身，而是要重新界定伊斯兰教的角色，体现的是市场原则对自然经济原则的胜利。总之，凯末尔政权的世俗化改革是在奥斯曼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以夺取和巩固政权为目标，但又在客观上推动了土耳其共和国现代化发展的一次政治行为。

(责任编辑：徐 拓 责任校对：樊小红)

¹ See M. Hakan Yavuz, "Political Islam and the Welfare (Refah) Party in Turkey," *Comparative Politics*, New York: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Vol. 30, No. 1, October 1997, pp. 63-81.

• 书刊评介 •

《亚非葡语国家发展研究》简介

安春英

2006年9月，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在澳门举行；同年，也是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启外交关系50周年。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国内相关研究学者撰写了有关亚非葡语国家的研究文章，并结集出版《亚非葡语国家发展研究》一书。本书由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秘书长李保平教授、北大非洲研究中心主任陆庭恩教授和北大非洲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王成安先生主编，2006年11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亚非葡语国家发展研究》是一本专题性的论文集。正文收录了有关亚非葡语国家经济、政治、外交、教育

和政治领袖的研究性文章，以及亚非葡语国家大事记，论及6个亚非葡语国家（东帝汶、安哥拉、莫桑比克、佛得角、几内亚比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经济、政治、外交、教育和政治人物的发展评述。附录包括《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全文及中国与亚非葡语国家关系大事记（1949~2006年）两部分。该书的出版有利于促进亚非葡语国家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入，推动对非洲各地区、各个领域研究的全面开展。

(责任编辑：徐 拓 责任校对：樊小红)

European Union's Policy towards Iran after the Cold War

Yin Bin

pp 30– 35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EU) and Ira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bilateral relations in the post- Cold War Middle East.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comparative stability of this area and expand its interest and impact, the EU has adopted a policy towards Iran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late term of the Cold War, characteristic of 'seeking transformation by engagement'. Along with the ad-

justment of Iran's inter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hanges of the Middle East situation, the EU policy has undergone a change from 'critical dialogue' to 'constructive dialogue', and has protruded its diplomatic orientation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solving the Iranian nuclear issue.

Power Reconstruction in Modern Linguistic Context The Secularized Reform of Kemal Regime

Zhou Shuqing

pp 36– 41

The foundation of the Turkish Republic in 1923 ended the traditional governance of Ottoman Empire and formally comple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However, the established forces of the Ottoman Empire which was historically connected with Islam had not lost all their economic position and still had their influence in the nation's regime structure and social life,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basis of the Kemal regime was not stable. Professedly, the secularized reform of Kemal regime was to realize the

political ideal of 'the sovereignty of people', but it was actually to reject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forces. The purpose of the secularized reform is to re- conform the powers of the nation and society so as to hold the power, the consequence of which is that the Ottoman Turkey completed its conversion from the feudalist empire to the modern nation, which laid a sound foundation for Turkey's going to modernization.

The Proper Law to Marriages with Foreign Elements in South Africa

Zhu Weidong

pp 48– 52

As a country with mixed legal systems, South Africa has adopted the ways of the countries with continental legal systems in classifying marital relations, dividing marital relations into 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propert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ouses. According to South Africa's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the personal relations of the foreign- related marriages are dominated by the related actions or by the laws of the regions where, when the dealings occur, the spouses inhabit, while the proper law to property relations rest with whether the prenuptial

contracts are signed or not between the spouses. If the prenuptial contracts not signed between the spouses, the property relations of the marriages should be dominated by the laws of the inhabited regions. However, if they are signed, the laws that are contracted can be proper to the marital property relations. The forms of the prenuptial contracts as well as their initial effectivenes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enuptial contracts and the abilities for either party to sign the contracts are all to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laws of other different countries.